

我國會計人員道德發展之探討：科系、 年級、性別與事務所工作經驗之影響

顏信輝*

淡江大學

簡 穗

淡江大學

摘 要

本研究以 Kohlberg (1969) 之道德發展理論為依據，採用 Rest (1986a) 之道德判斷測驗(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量表，對我國 203 位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及 132 位事務所查核人員進行道德發展檢測，以探討科系、年級、性別與事務所工作經驗對會計人員道德態度之影響。就學生樣本而言，研究發現一年級學生顯著比四年級學生具更高之 P 分數；女性學生比男性學生具更高之 P 分數；科系別對學生之 P 分數則無顯著影響。就事務所工作經驗之影響而言，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主管之道德判斷成熟度顯著高於基層查核人員與會計系大四學生；女性查核人員之道德判斷成熟度也顯著高於男性。此外，查核人員 P 分數之變化與道德發展主型階段分佈情形顯示，會計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成熟度並未因接受大學會計專業教育而有所提升，但事務所之工作經驗則對查核人員之道德判斷水準具提升效果。此現象可能透露出國內大學會計教育體系中道德教育之缺乏或其成效之不彰，而事務所人才擢升政策或工作經驗，對查核人員道德判斷能力之培養可以發揮正面之助益。

關鍵詞：專業道德、道德推理、道德發展、道德判斷測驗

*作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所提供之諸多寶貴修正意見。也謹此向屏東師範學院張鳳燕及海軍軍官學校呂維理兩位教授之協助表達謝意，感謝其 DIT 資料與意見之提供。本研究為國科會 NSC91-2416-H-032-006 計畫之一部份，感謝國科會提供之研究經費協助。

收稿日：2002 年 10 月
接受日：2003 年 12 月

The Effects of Program Majors, Years at College, Gender, and Auditing Experience on Accountants'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Sin-Hui Yen

Tamkang University

Sui Chien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program majors, years at college, gender, and auditing experiences affect the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of business students and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using the P-score as defined in Rest's (1986a) 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Kohlberg's (1969) 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CMD) model forms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P-sco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for a sample consisting of 132 auditors and 203 undergraduates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accounting an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P-sco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freshmen than for seniors, and substantially higher for females than for male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P-sco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auditors with a higher rank of supervisor to senior partner than for staff auditors and accounting senior students. Specifically, the analyses of the P-score change and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show that the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has not been enhanced by accounting educ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implying deficiency and/or ineffectiveness of ethics training in accounting programs. On the other hand, auditors' cognitive moral capability may benefit from practicing experiences in accounting profession, suggesting that promotion policy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may enhance auditors' mo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rofessional ethics, Moral reasoning, Moral development, DIT.*

Submitted Oct. 2002

Accepted Dec. 2003

壹、前言

會計專業人士與企業經理人之不道德行為不僅會直接對企業造成傷害，其所引發的信心危機也會對資本市場帶來嚴重的負面衝擊，美國的安隆(Enron)、IBM、全錄(Xerox)、世界通訊(WorldCom)、默克(Merck)藥廠、時代華納(Time Warner)等知名企業操弄會計資訊的醜聞¹造成美國股、匯市重挫即是明顯之實例，中時電子報91年7月10日之工商社論指出造成此種一連串會計醜聞之原因，乃是由於美國企業的執行長及財務長等高層主管，不重視會計專業素養所致²。Rampersad (2003)更指出安隆之破產就是肇因於管理當局之不道德行為所致(Enron is an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company that went into bankruptcy because it was undermined by management's unethical behavior)。故隨之因應之美國企業會計改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與我國目前推動之公司治理也均強調企業誠信之重要。台灣於1998年發生金融風暴之後，亦有多家企業(例如金緯纖維、國產汽車、正義、新巨群、環隆電氣與東隆五金等)³的簽證會計師與企業經理人因涉嫌財務報表或公開說明書不實而被列為刑民事案件的被告，除此之外，也出現因財報誠信問題而使股價受到重大打擊之企業(如太電)，或直接因財報誠信疑慮而被媒體作更嚴密關切之企業(如大眾、遠森...等)⁴。這些弊案也讓會計專業道德及其教育受到重視，例如陳依蘋(2002,12)指出：「萬事處理歸於一宗，道德的約束與教育，才是我們要去深思的，在安隆案中安隆管理階層對股東的責任、會計師的獨立性與對社會的責任在在都與道德有關。或許會計教育也應該要思考，會計教育除了會計專業的傳授之外，對危機處理、對職業道德、對與各界的相處與協調，都應該是會計教育的一環。」。

會計專業人士經常會面臨價值衝突的抉擇困境，而必需做出是非判斷並決定行動。例如：需在逃稅與避稅之間找到分界線；於選擇裁決性的會計方法時，往往要在表達經濟實況與操縱損益之間做抉擇；公開財務資訊時，在揭露程度與經濟後果之間審慎考量。面對這些道德衝突(ethical conflict)時，他們經常必需在自己、他人與社會整體的利益間做取捨。以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人員為研究對象之報告指出，台灣會計人員之道德成熟度不如美國(林松宏、葉誌崇與吳祥發 2002)，該研究之作者指出，這方面是我國必須努力的目標。另一項以國

¹ 根據BBC之報導 (<http://news.bbc.co.uk/go/em/fr/-/hi/english/business>)，安隆公司的內部調查報告指出從2000年10月初到2001年9月底，該公司利用與旗下特殊目的個體(SPE)間的交易來創造帳面利潤，使獲利灌水金額幾近十億美元；IBM在2001年第4季將出售光纖無線電話業務部門的3億美元非經常性收入列為經常性的營業所得；全錄公司則宣布過去5年錯列64億美元的營收，包括將未來數年才能入帳的19億美元列為收入；世界通訊坦承作假帳，將2001年1月至2002年3月間高達38億美元的費用支出列為資本支出入帳；默克藥廠則因子公司Medco在1999到2001年間將病人直接付給藥房的金額也納入營收，使該公司收入虛增124億美元。

² <http://tw.news.yahoo.com/2002/07/10/polity/ctnews/3367223.html>。

³ 資料來源：證券基金會2002/1/20彙總表，網址：<http://www.sfi.org.tw/>。

⁴ 詳見2003年5月8日精實新聞：「SAS恐引爆第2季營運地雷股，流動比率低的個股宜避開」。

內會計教師為研究對象之報告也指出，國內會計系教師認為不論企業界或是教育界，對會計學生之專業道德將會越來越重視（顏信輝與楊淑玲 2003）。由於會計系學生未來將扮演企業財務資訊之提供者或審核者角色，故探討其道德判斷水準的潛在影響因素，具有會計教育上重大之意義。但是目前國內卻少見探討影響會計人員道德發展變化類型與影響會計人員道德發展之可能變數的研究，究竟會計系學生在接受四年會計教育後，其道德推理能力如何變化？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經驗是否也與查核人員道德推理能力有關？性別是否扮演了解釋我國會計人員道德發展差異之重要角色？了解這些議題，有助提供會計教育界與實務界對提昇會計人員道德發展努力之參考。

由於專業判斷有賴於個人的信念和價值體系，故與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程度有關(Louwens et al. 1997)。Arnold and Ponemon (1987)也具體地指出道德判斷與發展的研究有助於深入了解決策者面臨道德衝突時所作的決定、辨認道德判斷差異所引發的問題、及其研究結果可作為專業道德規範或道德教育的指引。例如，安隆案主要係透過該公司內部員工所舉發之事例，可說明個人道德發展與企業決策關係之重要。但國內探討會計系學生與查核人員道德發展之研究並不多見，故激發本研究之動機。

多數學者認為道德發展與認知發展論(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有關，Kohlberg (1969)的泛文化研究證實，道德認知會依循一固定模式往上發展，此發展過程被區分為三層次(level)六階段(stage)，即為「認知道德發展模型」(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model; CMD model)，Kohlberg 認為道德發展至較高階段的個人比較可能採取正確的道德行動(Brabeck 1984)。Rest 根據此一理論而發展出 DIT (defining Issues Test)，做為道德判斷之檢測工具，其所衡量之「原則性道德分數」(principled morality score)，亦稱為 P 分數，則代表受試者之道德判斷成熟度。因為 Kohlberg 之道德發展模型與 Rest 之 DIT 工具廣為探討道德議題之學者所採用(如 Arnold and Ponemon 1991; Shaub 1994; Bernardi 1994; Ho 1997; Thorne 2001 等)，故本研究也以道德發展模型為理論依據而以 DIT 之 P 分數來衡量會計人士之道德發展情況。

就影響道德發展之變數而言，主修、年級與工作經驗均可能對會計人士道德態度與信念的調適造成影響，使得道德判斷成熟度有所差異。故本研究同時探討教育（主修與年級）與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經驗對會計人員道德發展之影響。在教育變數方面，本研究探討年級（一與四年級）與主修科系（會計與企管系）對學生道德判斷能力之影響；在工作經驗之影響方面，則檢視不同身份群組（就業前之會計系四年級學生、基層查核人員、與查核主管）道德判斷成熟度之差異。此外，雖然性別一直是常被探討的變數（如 Ruegger and King 1992; Shaub 1994; Giacomino and Akers 1998 等），惟性別與道德推理能力之可能關係，迄今國內外文獻均未見有穩定發現，加以目前男、女性在會計專業

或企業界的比例逐漸平衡，故本研究一併探討性別是否與道德發展有關。

具體而言，本研究藉由 P 分數之衡量以檢測年級、科系、工作經驗、與性別等因素是否影響道德判斷水準，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 1.比較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水準是否因年級不同而有差異？
- 2.探討會計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水準是否異於企管系學生？
- 3.檢視就業前之會計系大四學生、基層查核人員、與查核主管之道德判斷水準是否有所差異？
- 4.分析性別因素是否造成學生道德判斷水準有所差異？
- 5.比較會計系大四學生、基層查核人員、與查核主管之道德判斷水準是否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本研究針對 203 位大學生與 132 位事務所查核人員進行 DIT 檢測發現，一年級學生顯著比四年級學生具更高之 P 分數；女性學生比男性學生具更高之 P 分數；科系別對學生之 P 分數則無顯著影響；查核主管之道德判斷成熟度顯著高於基層查核人員與會計系大四學生；女性會計系大四學生與女性查核人員之 P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此外，根據會計人員 P 分數之變化與道德發展主型階段分佈情形，亦再度指出會計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成熟度並未因接受大學四年之會計專業教育而有所提升，但事務所之職業社會化過程對查核人員之道德判斷水準則有提升效果。就作者所知，本研究為國內第一篇分析會計系大一、大四學生、會計師事務所基層查核人員與高階查核主管等歷程，其道德推理能力變化情形之研究。此外，本研究也以企管系為對照組，探討會計系教育是否造成會計系學生有與企管系學生不同之道德推理能力。同時，也對國內外於研究性別與道德發展尚未有穩定結論之議題上，提供了更多本土化實證證據。

本文結構如下：除第一節為導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外，第二節為道德發展理論背景與相關文獻之回顧，並據以推衍本研究之研究假說，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所用之問卷、受試者與施測程序及統計方法，第四節為研究結果與啟示，第五節為結論、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本節說明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論與 DIT，並回顧教育、年級、性別與事務所工作經驗等變數對會計人員道德發展影響之文獻並據以推衍研究假說。

一、道德認知發展論與 DIT

在探討道德理論時，心理學家認為道德觀念或道德行為，都是在社會文化環境中，個人經由與周圍的人、事、物產生交感作用逐漸形成的。因此，談道德理論者，多持發展論學者的看法。認知發展論強調「人」的主體性，認為認知發展有賴遺傳、環境、成熟、與學習的交互作用，其發展階段係有機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平衡模式，此理論之道德觀注重行為者本身的思考與判斷（黃光明 1999）。此一論調首先由 Dewey 從哲學的觀點，提出學理性的看法；其後由 Piaget 從心理學的觀點，提出驗證性的階段概念；而後 Kohlberg 經三十多年的泛文化研究，證實個人的道德認知會依循一固定模式往上發展，而有「階段性」，其所提出之「認知道德發展模型」，將道德理性之進階過程區分為三層次六階段，每個層次均含兩階段，每個階段係循序發展、不可躐等。

此模型各層次之要旨如表一所示，六個階段如階梯般往上漸進。第一層次稱為道德成規前期(pre-conventional level)，階段一、二屬之，處於階段一之個人其行為係為規避懲罰而服從於外力或權威，處於階段二之個人則將人際關係視為換取個人利益之工具。第二層次稱為道德成規期(conventional level)，階段三與四屬之，階段三強調人際關係的維繫，傾向於附和大眾意見或順從群體的行為以取得他人的好感。處於階段四的個人，其行為強調對法律、秩序、及專業規範之遵守。第三層次稱為道德成規後期或原則期(post conventional or principle level)，此層次分為階段五與六；發展至階段五的個人強調對他人權益的尊重，並遵守全體社會共同決定的行為標準或公眾所默認的社會規約，發展至階段六者，其所強調的是超乎法律條文的普遍性道德原則，諸如正義、責任與公平等，並以社會整體的利益為優先考量。

表一 Kohlberg 道德發展模型的三個層次

層次	考量的焦點	導向	遵循何種定義之道德理
道德成規前期	自我利益	懲罰與獎賞	外部權威
道德成規期	社團	法律與秩序	社會群體
道德成規後期(原則期)	普遍性的原則	原則	內在良知

資料來源：Thorne, L. 2001. Refocusing ethics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An exa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udents' tendency to use their cognitive moral capabi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9: 105.

國外多位學者從事會計與審計領域的道德發展研究⁵所採用的 DIT 量表即是 James Rest 承繼 Kohlberg 的「認知道德發展模型」並改善其道德判斷量表

⁵ 相關研究詳 Arnold and Sutton. 1997.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212-221 的表列文獻回顧。

(moral judgment scale, MJI)而得。Rest 參照六階段發展理論，設計出一套客觀而標準化且廣為研究者採用的道德判斷測驗 (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又稱「界定問題測驗」)。此測驗含六則道德困境故事，配有十二個陳述(statement)，受試者須由各陳述中選出四項最重要者並加以排序(ranking)。因每個陳述可歸屬於 CMD 模型的某一階段⁶，故可衡量出受試者對「原則性道德思考」(階段五與階段六)之重視程度，即為 P 分數，代表受試者面臨道德困境時，其道德認知與判斷的成熟度。國外會計領域的 DIT 研究曾發現 P 分數與多項專業工作品質有關，例如，預警資訊之揭露(Arnold and Ponemon 1991)、重大性判斷、風險認知(Ponemon and Gabhart 1993)、重大財務報表誤述或舞弊之偵知(Bernardi 1994)等。在國內研究方面，除了林邦傑、胡秉正與翁淑媛(1986)接受教育部委託，以 DIT 對國內大專生之道德發展作大規模之調查外，教育領域之諸多研究也都廣為應用此工具(如林宜滢 2003、劉慧慧 2002、劉靖國 2002、林文堯 1994...等)，而 DIT 在國內會計領域之應用則有楊淑玲(2003)、林松宏等(2002)、傅若昀(1996)與梁薰方(1994)等。多數之國內研究也支持 DIT 之 P 分數與道德價值取向相關(如劉金花 1990；林煌 1990...等)。由此可知不論國內外研究，於探討道德發展之相關議題上，DIT 是一廣為接受之研究工具。

二、相關變數之實證發現與研究假說之推衍

本小節回顧對會計人員道德推理能力可能產生影響之變數的相關文獻並據以推衍各研究假說。

1. 年級與科系對道德判斷能力之影響

Davis and Welton (1991)指出，多元的企業環境與大學環境能提昇個人的道德行為，大學生適當道德行為的認知，可在大學生活逐漸成熟，而且符合社會的預期。McNeel (1994)針對 7 所人文藝術(liberal arts)學院、3 所大學、及 2 所聖經學院(bible college)的學生所作的數篇實證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四年的大專教育對原則性道德推理之成長有顯著的影響。針對會計系學生道德發展之研究也有類似之發現，如 Green and Weber (1997)指出因為高年級之會計系學生接受美國會計師協會之行為準則，故其道德發展與低年級有別。Ponemon and Glazer (1990)發現 54 位主修會計之大四學生，其 DIT 分數高於 46 位大一之學生；Jeffrey (1993)也有類似之發現。國內張慈娟(2001)也發現會計系大四學生比大一學生更反對盈餘管理，且更重視財務報表使用者之利益。

⁶ 各個陳述可被歸屬於階段二、三、四、五 A、五 B、六、A 項目、與 M 項目中的一種，A 項目被稱為「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題目，此為反對現存社會體制，嚮往烏托邦式社會的心理導向所致，其道德發展階段應介於 4~5 之過渡期間，M 項目則為無意義(meaningless)的陳述，旨在瞭解受試者是否不加考慮，隨意作答。

然而，教育年數是否能提昇學生之道德判斷水準，亦有不同之研究發現。尤其對商學學生之效果可能更低，例如前段 McNeel (1994) 之後設分析即發現教育對商學學生之道德提昇之效果，僅達其他主修之一半而已。Henderson (1988) 指出商學學生處理道德困境時，有缺乏道德認知(ethical naïve)的現象存在；Schwartz et al. (1991) 更進一步認為，由於商業學校(business schools)忙著教導學生如何成功牟利，以致學生在正確的行為與謀取的作為間無法區辨其差異。Shaub (1994) 對某大學 91 位會計系學生所做的 DIT 研究指出，教育年數與 P 分數呈現負相關，但不顯著；Lampe (1994) 亦指出，其所長期（四年）觀察之會計學生並未因會計教育期間長短而使 P 分數有顯著改變。Ho (1997) 對台灣某大學的會計系學生所做的 DIT 檢測亦發現，大四學生的平均 P 分數(32.94)低於大一學生之平均 P 分數(35.00)，惟其差異亦不顯著。Abdolmohammadi et al. (2000) 以某商學院的學生做 DIT 檢測則指出，學生的 P 分數會因年級而有顯著差異，且四年級學生的平均 P 分數(43.31)大於一年級學生的平均 P 分數(31.12)，然而，該研究對 42 位四年級學生所作的長期性檢測(longitudinal study)卻發現，31% 受試者的 P 分數隨著年級增加而呈下降趨勢。Thorne (2001) 針對 130 位加拿大某大學主修會計之學生進行 DIT 檢測，發現教育年數與 P 分數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p 值為 0.04)。國內研究方面，林鳳麗(2002)探討 7 所大學會計系與企管系大一、大四學生對 5 項道德兩難困境之態度發現，前述學生受試樣本之道德觀並不會隨年級的增加而有所不同。

於 Borkowski and Ugras (1998) 之後設分析發現 35 個探討年級與專業道德議題之研究中，有 29 % 年級有顯著差異，51 % 不顯著，20 % 則是部分顯著部分不顯著。由於年級對道德判斷能力之影響在實證結果中未趨一致，故本研究形成虛無假說如下：

H1：大四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之 P 分數與大一新生並無顯著差異。

此外，不同的主修科系可能使學生在道德信念與態度的調適上產生差異。會計專業與其他專業不同的是，委託人或企業利益並非會計專業唯一的考量，公眾利益的維護亦是其重要職責之一，因會計專業價值之維繫有賴公眾之信任，而高度專業道德卻是取得公眾信任之重要條件，故會計教育對職業道德之觀念亦多所強調。相同的，企管系因為培育未來企業之經理人才，直接涉及企業諸多經營決策之制定，因此企管系教育也對企業倫理、行銷道德...等有所強調。但由於不同科系之出發角度是不同，決策影響之利害關係人也有別，故是否會因科系教育不同，令學生有不同之道德發展，學者亦有所探討。

Jeffrey (1993) 針對同一所大學之會計、商學、及人文科系學生所進行的 DIT 實證研究發現，會計系學生之 P 分數較其他主修學生高；在各受試群組中，會計系四年級學生具有最高之 P 分數。Clikeman and Henning (2000) 亦發現大學會計學程的社會化過程(socialization process)，使得會計系的大四學生比其他商學

科系的大四學生較不願意進行報導盈餘的管理（例如，使用不當的會計處理以虛增報導盈餘），但是這些學生在大二時並無此差異。Pierre et al. (1990)採用DIT 衡量大四之商管學生道德發展情況也均指出，會計系之大四學生比其他商管科系之大四學生具有更高之 P 分數；劉益榮(2000)使用多元道德量表(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MES)，以台灣中部 3 所大學的 771 位企管系與會計系學生為受測者，進行個人價值觀與道德判斷及其關聯性研究，該研究之結論指出會計系學生比企管系學生較具道德感；林鳳麗(2002)將劉益榮之 3 所大學資料擴大至 7 所大學後，也發現會計系學生之道德觀明顯高於企管系學生。

然而，亦有某些認知發展的研究（例如 Armstrong 1993；Armstrong and Mintz 1989；Cohen and Pant 1989；Hiltebeitel and Jones 1991）發現，大學會計學生之道德認知能力(cognitive moral capability)並未高於其他科系的大學生。Ponemon and Gabhart (1993)亦發現會計系學生之道德發展較其他主修學生為低。Shaub (1994)認為某些非原則性思考者(nonprincipled thinker)可能較傾向於對規則之遵循(rule-oriented)，而此類遵循傾向屬於道德發展模型之階段四，故而其 P 分數偏低（因為 P 分數係捕捉階段五、六之傾向）。前述 Lampe (1994)對其所發現會計學生並未因會計教育期間長短而使 P 分數有顯著改變之解釋，亦歸因於會計系學生遵循具體規範(code-implied rules)之學習傾向。

Beltramini et al. (1984)以 23 州 28 所大學 2,856 位大學生參與之大規模企業倫理研究卻發現，大學生對企業倫理之關心與態度，並不會因主修不同而有差異。Borkowski and Ugras (1992)、Green and Weber (1997)也都發現主修並不顯著影響學生之專業道德態度。張慈娟(2001)對企管系和會計系學生在盈餘管理及財務資訊揭露有關問題（包括忠實表達財務報表、充分揭露財務資訊、財務資訊揭露的成本效益之考量及管理當局的責任）態度上之差異，作為衡量會計教育對學生道德認知之成效影響，僅有在對管理當局的責任此態度的成長大於企管系學生，由此顯示現行大學會計專業教育，並沒有比其他商學教育更重視建立學生對專業道德認知的培養。

Borkowski and Ugras (1998)針對 30 個研究商管主修不同對專業道德之態度是否具顯著差異之後設分析發現，20%之研究發現顯著差異，57%則未發現顯著差異，其餘 23%是部份顯著和部份不顯著之結果，因過去實證研究結果未有一致性之結論，本研究對此議題提出虛無假說如下：

H2：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之 P 分數無顯著差異。

2. 工作經驗對道德發展之影響

Rest (1986b)認為如果工作環境對道德發展有所鼓勵，則成員應會致力於道德判斷水準之提升。由於審計工作強調職業道德之秉持，故事務所之工作環境

應會對查核人員之道德判斷成熟度有所激發。然而, Ponemon (1992)卻指出事務所存在著阻礙道德發展之社會化情形, 亦即事務所經理與合夥人之道德發展大多落在階段 3 且具同質性, 而他們在人才拔擢與升遷時會傾向於遴選與自己道德觀相近的人, 此種「遴選-社會化」(selection-socialization)現象造成道德判斷水準過高的人可能無法獲得晉升或選擇離職。除了遴選合夥人有社會化之實證發現外, Abdolmohammadi et al. (2003)也發現對新進員工之遴選亦出現此現象。該研究以來自當時美國 5 大事務所之 90 位新進員工為受試者, 發現事務所傾向僱用對道德判斷據某特定之認知類型(sensing/thinking)之員工, 而此種認知類型正是道德發展程度(以 DIT 之 P 分數衡量)最低者。

惟 Cohen et al. (2001)則對事務所的「遴選-社會化」現象採取不同的著眼點, 而認為有些事務所將候選者的「道德標準」(ethical standard)列為第三重要的評選依據⁷, 故可合理預期事務所會遴選道德判斷能力較高者。雖然兩種觀點不同, 但他們均認為事務所的遴選政策或是工作經驗可能會影響查核人員的道德發展情形。

在道德發展變化之實證方面, Ponemon (1992)發現美國查核主管受測者(經理與合夥人)的平均 P 分數會隨著職階升高而呈下降趨勢, Shaub (1994)的美國受測者亦有類似之情形, 其下降趨勢則始自 senior 職階, 但是針對加拿大查核人員所作的 DIT 檢測(例如 Ponemon and Gabhart 1993; Etherington and Schulting 1995), 並未發現職階與 P 分數呈負相關。Cohen et al. (2001)針對 213 位加拿大商業科系學生(多數為會計之主修)與 127 位五大事務所從業人員進行道德決策之分析研究, 其結果指出在八個商業個案中, 有七個個案, 事務所從業人員從事道德上有爭議行為之意願較學生為低(有三個具顯著性)。

為檢視會計系大四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在進入事務所後是否持續發展, 以及事務所是否存在「遴選-社會化」之現象, 本研究針對三種身份別(就業前之會計系大四學生、基層查核人員、查核主管)之會計人員的 P 分數進行比較, 建立虛無假說如下:

H3: 就業前之會計系大四學生、事務所主任級(不含)以下之基層查核人員、與事務所主任級(含)以上之查核主管三組間的 P 分數無顯著差異。

3. 性別差異對道德判斷能力之影響

Kohlberg 的發展階段論曾被 Gilligan (1982)批評為存在有性別偏誤(gender

⁷ 根據 Ahadiat and Smith (1994)的研究發現, 在 22 個評選應徵者的因素中, 樣本事務所的人事主管將「道德標準」(ethical standard)列為第三重要的評選依據, 僅次於專業行為(professional conduct)與可靠性(reliability)。

bias)，因為女性會偏重於「關懷」(caring)的心理傾向，此一傾向會造成女性的 P 分數偏低，且因 Kohlberg 的發展模型著重於正義規範(justice-rule)，而男性對正義性的思考較為強調(Shaub 1994)，故男性之 P 分數會較高。然而，性別差異對道德判斷的影響，在實證研究上有不同的(mixed)結果。

Ruegger and King (1992)對 2,196 位大學生所做的大規模調查發現，在商業倫理個案中，女性的認知比男性較具道德感。在會計領域中，亦有某些研究(例如 Bernardi and Arnold 1997；Pierre et al. 1990；Shaub 1994)發現女性查核人員或會計學生比男性具有較高的 P 分數。Eynon et al. (1996)以 95 位美國學生及 51 位愛爾蘭學生為樣本，以 DIT 量表進行研究，發現會計系女生所展現之道德推論水準是比男同學高。劉益榮(2000)以台灣中部 3 所大學的 771 位企管與會計系學生為受測者之道德判斷研究亦發現女性學生比男性學生較具道德感，林鳳麗(2002)於擴大劉益榮受試者樣本數後，仍發現商學女性學生較男生具有更高之道德感。楊淑玲(2003)以 65 位國內上市公司主辦會計、63 位會計師及 287 位會計系大四學生為受試者之研究發現，女性對於學習行為會持較高之道德標準。

不過亦有研究未能發現性別影響道德發展或判斷，例如 LaGrone et al. (1996)發現性別與會計系學生 DIT 分數並無顯著關係。又如前段楊淑玲(2003)之研究雖發現女性在「學習行為」上會較男性持更高之道德標準，但是在「會計實務」上，二者之道德態度就無顯著差異。Borkowski and Ugras (1992)、Gautschi and Jones (1998)也均未發現性別差異存在於美國商管科系學生中。而 Giacomino (1992)、Giacomino and Akers (1998)兩篇比較美國會計系與非會計系學生道德之研究，則均發現性別效果是混合的。Ford and Richardson (1994)回顧 14 篇相關研究並提出結論，其中 7 篇顯示女性較可能從事道德的行為，另 7 篇則發現性別對道德信念無顯著影響力。根據 Borkowski and Ugras (1998)之後設分析，47 篇探討性別與專業道德關係之研究中，有 49%發現顯著關係、34%並未發現顯著關係，其餘 17%是部份顯著部份不顯著。

由於性別對道德發展之影響亦無一致性之實證結果⁸，故本研究針對性別變數亦以虛無假說之方式表達如下：

H4：就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而言，男性與女性之 P 分數無顯著差異。

⁸ 根據前述有關科系、年級與性別對道德發展影響之文獻回顧，發現過去研究對這些變數影響之發現並不穩定，Borkowski and Ugras (1998)後設分析所分析之研究係取自 1985 至 1994 之相關研究，其結論較偏向(但證據力不強)女性之道德發展高於男性，而年長者也高於年輕者，不過大學科系教育之影響則無任何發現。而 Ford 與 Richardson (1994)則回顧 1974 至 1995 之相關研究，基本上對於性別、主修、年級等變數之影響，也發現各研究之結果十分不穩定。但這些都是國外之研究，道德發展與文化可能具有密切關係，所以前述國外的不穩定發現不一定可類推於國內情況，加以前述國外研究也多為 1995 以前。惟國內目前探討商管學生科系、年級及性別變數對道德發展可能影響之研究，尚未累積有足夠之證據可提出較穩定之結論。後續研究者可探討這些變數與道德發展之可能關係並與國外結果進行比較。作者感謝審查教授提出此點寶貴之後續研究建議。

H5：就會計系大四學生與事務所查核人員而言，男性與女性之 P 分數無顯著差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 DIT 量表對不同群組的受試者進行 DIT P 分數之衡量，以檢定相關研究假說，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研究工具

本實驗所採用之 DIT 量表，乃是根據 Rest (1986a) 之 DIT 手冊中的六個故事，其編譯則參酌教育部委託研究的「大專道德判斷測驗手冊」(林邦傑等, 1986) 之中文 DIT，再經作者加以修正而成。問卷之作答方式分為兩個部分，一為重要性評定(rating)，二為重要性排列(ranking)。重要性評定分為 5 個等級，受試者針對每一個故事中的十二個敘述句依其個人考慮後在「最重要」、「重要」、「還算重要」、「不重要」、「毫不重要」的 5 個等級選項中選定一個，以評定其重要性程度。重要性排列係在評定 12 個敘述句後，再綜覽全部的評定，並依其重要性程度的大小，從其中依序選出「第一重要者」、「第二重要者」、「第三重要者」、「第四重要者」的敘述，作出排列。將受試者重要性排列的回答，加權計分後可得其各階段之得分比例，合計受試者階段五與階段六之得分權重即為 P 分數。至於重要性評定則作為核對受試者作答可靠性的參考。

在測試受試者的道德發展時，DIT 的效度一直是被各領域(含會計)研究者所肯定，Arnold (1997)、Lord and DeZoort (2001)及 Ponemon (1995)對此有詳細的說明或整理。本研究之附錄列示一則 DIT 道德案例及受試者回答問題之範例，完整的道德困境故事與 DIT 操作程序詳 Rest (1986a)。

二、受試者與施測程序

1. 學生受試者

為探討學生年級、科系、性別等因素對其 P 分數之影響，故以會計系一年級新生及四年級學生與企管系一年級新生及四年級各一班學生為受試者。受試者皆來自國內北部某大學之學生，DIT 之施測皆安排於各班之實習課堂上進行，除了在問卷首頁用範例說明作答方式外，並由施測者作現場口頭說明，以便對施測程序有較好之控制。為減少社會偏好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之影響，問卷之填答採匿名方式進行，且強調不會對問卷進行個別分析，學生完成填寫之時間約需 20~30 分鐘。

學生樣本資料之回收情形如表二，完整填答問卷為 239 份，依 Rest (1986a) 之可靠性檢查規則剔除廢卷 36 份後，剩餘有效問卷為 203 份，整體學生受試者之廢卷率約為 15.1%。學生樣本之年級、科系及性別分布情形如表三所示，整體而言，各分群樣本之分布比例未有懸殊之差異。

表二 學生受試者 DIT 問卷回收份數統計表

組別\項目	回收	未完整填答	廢卷剔除	廢卷率	有效樣本
會計系一年級	59	3	5	8.9%	51
企管系一年級	71	5	10	15.2%	56
會計系四年級	60	5	9	16.4%	46
企管系四年級	68	6	12	19.4%	50
合計	258	19	36	15.1%	203

^a 廢卷剔除係指依 Rest (1986a) 之可靠性標準所剔除之廢卷份數。

表三 學生受試者人數分布情形(n=203)

項目\組別	年級別		科系別		性別	
	一	四	會計	企管	男	女
人數	107	96	97	106	89	114
百分比	52.71%	47.29%	47.78%	52.22%	43.84%	56.16%
合計	203		203		203	

2. 查核人員受試者

為探討會計師事務所社會化現象，另針對基層查核人員 (level I、level II、與領組) 與查核主管 (主任、副理、經理、與合夥人) 進行 DIT 檢測。基層查核人員之受試者係透過五位連絡人分發 DIT 問卷，此五位連絡人有四位為四家大型事務所之基層查核人員，有一位係一家中型事務所之合夥人。查核主管之 DIT 問卷係委由兩位連絡人 (某家大型事務所之高階主管與某家中型事務所之合夥人) 分發。查核主管之問卷回收期間約三週，基層查核人員之問卷回收期間約六週。問卷之填答亦採匿名方式進行，其首頁亦用文字與範例說明作答方式，整體查核人員之問卷回收情形如表四所示。查核主管受試者因連絡人職位較高，問卷催收效果較佳，故回收率高達 100%，而基層查核人員受試者因部分連絡人位階不高，催收效果較不如前者，問卷回收率為 69.4%。未剔除廢卷前之完整回答份數分別是：主管組 69 份、基層組 80 份。廢卷率則分別為主管組 5.8%，基層組 16.3%，整體查核人員受試者之廢卷率約為 11.4%，合計有效問卷為 132 份。

表五列示樣本之基本資料結構，整體而言，受試者之平均年齡為 29.19 歲，擔任現有職務之平均年數則為 1.96 年。女性人數佔 61.4%，大於男性之 38.6%，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佔 95.5%，已取得國內或國外之會計師執照者佔 23.5%。

表四 會計師事務所受試者 DIT 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組別\項目	分發	回收	回收率	未完整填答	廢卷剔除	廢卷率	有效樣本
基層查核人員	121	84	69.4	4	13	16.3	67
查核主管	69	69	100.0	0	4	5.8	65
合計	190	153	80.5	4	17	11.4	132

^a 回收率係指回收份數佔分發份數之比率，即 $C = B \div A$ 。

^b 廢卷剔除係指依 Rest (1986a) 之標準所剔除之廢卷份數。

^c 廢卷率係指廢卷剔除份數佔完整填答份數之百分比，即 $F = E \div (B - D)$ 。

表五 會計師事務所受試者基本資料(n=132)

項目/組別	基層查核人員 (n=67)	查核主管 (n=65)	全體 (n=132)
人數			
男性人數佔比	44.8%	32.3%	38.6%
女性人數佔比	55.2%	67.7%	61.4%
平均年齡	26.78	31.68	29.19
學歷			
專科人數佔比	7.5%	1.5%	4.5%
大學人數佔比	71.6%	80.0%	75.8%
研究所以上人數佔比	20.9%	18.5%	19.7%
是否取得會計師執照			
取得人數佔比	7.5%	40%	23.5%
未取得人數佔比	92.5%	60%	76.5%
平均擔任現職年數	1.30	2.67	1.96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 P 分數作為道德判斷水準之指標，除了採 t 檢定對不同組別之平均 P 分數進行初步檢定外，為控制相關變數並檢測變數間是否具交互作用，另採用變異數分析檢定研究假說。

肆、研究結果與啟示

一、敘述統計資料

學生受試者之平均 P 分數如表六所示，整體樣本之平均 P 分數為 35.84，此值與 Ho (1997) 相近。該研究之樣本亦為台灣某大學之會計系大一、大四學生與畢業生，也是採 Rest 之六個 DIT 案例，該研究獲得之平均 P 分數為 34.78(n=90)，本研究與之比較並未有顯著差異(t=0.731)，顯示本研所得之結果應是可靠的。

表六 學生受試者P分數之敘述統計資料(n=203)

平均數\組別	年級別		科系別		性別		全體 (n=203)
	新生 (n=107)	四年級 (n=96)	會計 (n=97)	企管 (n=106)	男性 (n=89)	女性 (n=114)	
平均數	38.47	32.90	35.69	35.97	33.22	37.88	35.84
標準差	12.21	11.29	11.20	12.89	11.42	12.24	12.08
最大值	63.33	60.00	60.00	63.33	60.00	63.33	63.33
最小值	10.00	11.67	11.67	10.00	10.00	10.00	10.00
區間	53.33	48.33	48.33	53.33	50.00	53.33	53.33

會計系大四學生及查核人員之 P 分數敘述統計資料如表七所示，就三種身份群組而言，查核主管⁹之平均 P 分數最高(38.72)，基層查核人員之 P 分數居次(35.12)，最低者為會計系大四學生之平均 P 分數(33.44)。男性樣本之平均 P 分數為 33.71，低於女性樣本之 37.35。在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之 P 分數方面，本研究受試者之分數(38.72 及 35.12)高於林松宏等(2002)45 位國內查核人員之平均 P 分數 31.611，也更接近林松宏等所比較之 58 位美國查核人員之平均 P 分數(40.388)。

表七 會計系大四學生與查核人員P分數之敘述統計資料(n=178)

平均數\組別	年級別		科系別		性別		全體 (n=203)
	新生 (n=107)	四年級 (n=96)	會計 (n=97)	企管 (n=106)	男性 (n=89)	女性 (n=114)	
平均數	38.47	32.90	35.69	35.97	33.22	37.88	35.84
標準差	12.21	11.29	11.20	12.89	11.42	12.24	12.08
最大值	63.33	60.00	60.00	63.33	60.00	63.33	63.33
最小值	10.00	11.67	11.67	10.00	10.00	10.00	10.00
區間	53.33	48.33	48.33	53.33	50.00	53.33	53.33

二、t 檢定與變異數分析結果

就學生樣本而言，以 P 分數為依變數，分別對各獨立變數進行 t 檢定之結果如表八所示，以科系別分組，受試者之 P 分數並無顯著差異，若以年級或性別進行分組，則受試者之 P 分數皆有顯著差異。新生之 P 分數顯著高於四年級；女性學生之 P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

為了解變數間是否具交互作用，進一步執行 2 (科系：會計與企管) × 2 (年

⁹ 查核主管組包括會計師、經理、副理與主任等職務，本研究進一步將查核主管組細分為二：會計師經理組 (n=27) 與副理主任組(n=38)，兩組 P 分數分別為 39.20、38.38，經 t 檢定發現 P 分數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p>0.76)。此外，如果將會計師、經理、副理合併一組(n=36)，而與主任組(n=29)之 P 分數進行 t 檢定，也是未達顯著水準 (p>0.83)。此外，在此種不同身分組別下，性別於兩組之分佈也未見重大差異 (卡方檢定未達顯著水準，p=0.794)。因此，本研究將會計師、經理、副理與主任等職務合併為查核主管組。

級：一與四年級) $\times 2$ (性別：男與女) 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九所示。表 9 指出變數間無顯著之交互作用，而年級與性別則對受試者之 P 分數具顯著影響。所分析結果推翻研究假說 1 與假說 4，但研究假說 2 則無法推翻；亦即年級與性別對受試者之道德判斷水準有顯著影響，科系別對學生之 P 分數則無顯著影響。

表八 學生樣本 P 分數 t 檢定結果(n=203)

變數	組別	n	Mean	t-值	p 值(2-tailed)
年級	新生	107	38.47	3.365	0.001
	四年級	96	32.90		
科系	會計	97	35.69	-0.169	0.866
	企管	106	35.97		
性別	男性	89	33.22	-2.771	0.006
	女性	114	37.88		

整體而言，不論 t 檢定或變異數分析均得到相同之發現：一年級學生 P 分數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生；女性顯著高於男性，但科系間並無顯著差異，由於科系與年級之交互作用也不顯著，所以代表不論會計系與企管系同學間之差異，於大一及大四階段是相類似的，故顯示專業教育並無造成二個科系學生之 P 分數有不同之變化，均反而造成學生之 P 分數顯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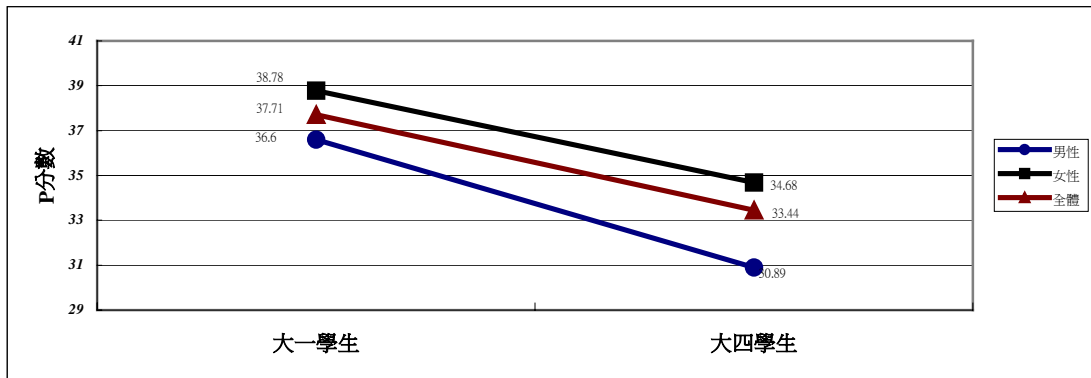
表九 學生樣本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n=203)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值.
年級	1,612	1	1,612	12.009	0.001
科系	4	1	4	0.031	0.861
性別	1,184	1	1,184	8.824	0.003
年級 \times 科系	35	1	35	0.265	0.607
年級 \times 性別	27	1	27	0.207	0.649
科系 \times 性別	185	1	185	1.382	0.241
年級 \times 科系 \times 性別	118	1	118	0.881	0.349
Error	26,182	195	134		
Total	290,200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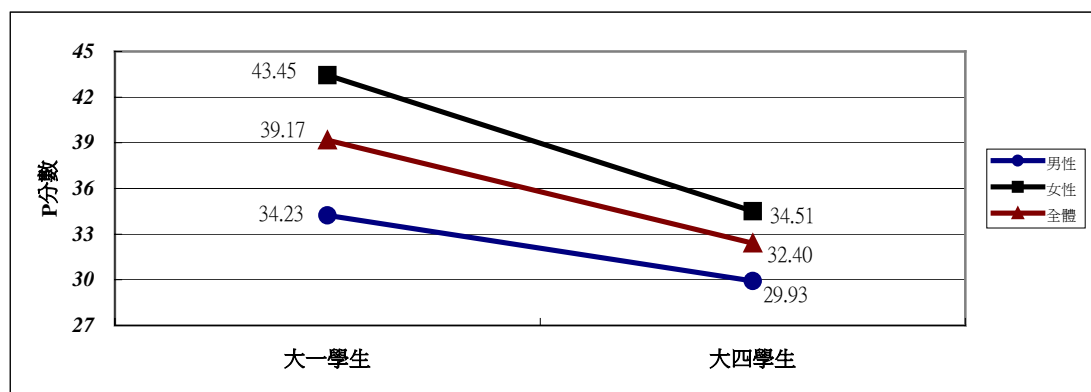
^a $R^2 = .112$ (Adjusted $R^2 = .080$)，模式之 $p < 0.001$ 。

表九顯示「性別」自變數與其他自變數（科系或年級）之交互作用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女性學生的道德發展高於男性之發現，並不因科系別（會計或企管）或是年級別（一年級或四年級）而有所改變。此外，科系與年級自變數均不顯著且其交互作用也未達顯著水準，代表不論是主修會計系或企管系，不論是四年級或是一年級，學生之道德發展程度並未產生重大變化。圖一、二分

別顯示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之性別與年級的 P 分數分配情形，由圖中可了解女性學生在不同科系與年級中，其道德發展程度都是顯著高於男性：



圖一 會計系大一與大四之男、女性學生 DIT P 分數分配圖



圖二 企管系大一與大四之男、女性學生 DIT P 分數分配圖

本研究另針對事務所工作經驗對道德判斷水準之影響進行假說 3 之檢定。由於查核人員受試者來自不同事務所（查核主管主要來自 1 家大型事務所，及其他，故可分為兩組。而基層查核人員主要來自 5 家事務所，故可分為 5 組），為檢測其 P 分數是否因事務所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分別針對查核主管與基層查核人員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指出 2 組查核主管之平均 P 分數並未因事務所別而有顯著差異（p 值為 0.469），而事務所別對 5 組基層查核人員之平均 P 分數亦不具有顯著影響（p 值為 0.925），於是後續分析將查核主管與基層查核人員樣本各視為一整體集合，以進行假說之檢定。

由於本研究於前節學生組之分析發現性別變數達顯著水準，故本節分析仍包括性別為變數，進行 3（身份：會計系四年級學生、基層查核人員、與查核主管） \times 2（性別：男性與女性）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一併檢測身份別與性別是否具交互作用。其結果如表十所示，二因子間並無交互作用，身份別則具主要效果（ $p=0.034$ ），性別也再次達顯著差異。由於身分別變數有三個處理水準，

故進一步執行 Scheffé 多重比較以檢視不同身份群組間之平均 P 分數差異。

表十 會計系大四學生與查核人員 P 分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n=178)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值
Corrected Model	1,383	5	276	2.435	.037
Intercept	195,781	1	195,781	1,723.194	.000
身份	783	2	391	3.449	.034
性別	474	1	474	4.174	.043
身份×性別	47	2	23	.208	.812
Error	19,541	172	113		
Total	251,632	178			
Corrected Total	20,925	177			

^a $R^2 = .066$ (Adjusted $R^2 = .039$)，模式之 $p=0.037$ 。

表十一 會計系大四學生與查核人員 P 分數之 Scheffé 多重比較結果(n=178)

組別	比較結果	平均數差異	p 值
會計系大四學生(A)	A < B	1.68 (B - A)	0.712
基層查核人員(B)	B < C	3.60 (C - B)	0.156
查核主管(C)	C > A	5.28 (C - A)	0.039

表十一顯示會計系大四學生之平均 P 分數雖低於事務所之基層查核人員，惟其差異不顯著，三組中以事務所查核主管之平均 P 分數最高，且顯著高於會計系大四學生¹⁰。根據前述檢定結果，推翻假說 3：雖然就業前之會計系大四學生與已就業之基層查核人員之 P 分數並無顯著差異，但被擢升至查核主管之受試者，其 P 分數則高於基層查核人員且顯著高於就業前之會計系大四學生。

此一情形可能如 Coheh et al. (2001)所主張，由於事務所將道德判斷能力視為遴選人才之重要條件，故入選者之道德判斷水準會高於落選者；朱寶珠(1994)的研究亦指出，我國會計師認為理想的查帳人員應具備的特質，以職業道德與操守為最優先。也許是國內事務所遴選查核主管時，對候選人之道德操守相當重視，故而道德思辨能力較成熟者，其晉升為主管之機會較大，使得我國查核主管受試者之 P 分數並未因職階上升而有下降情形。

¹⁰系大四學生之平均 P 分數亦呈顯著差異 ($p=0.013$)。但事務所查核主管與基層人員之 t 檢定結由於各組人數不相等時，使用 Scheffé 法較富堅韌性(robust)，它可控制整體 α 值等於 0.05。但 Scheffé 法係在考驗每一個平均數線性組合，並提供水準保護，而非只是考驗一對平均數間的差異情形，因而 Scheffé 法顯得較為保守 (吳明隆，SPSS 統計應用實務，2001 年，7-15~7-16)，故另行針對各兩組平均數進行 t 檢定，其結果指出會計系大四學生與基層查核人員之平均 P 分數亦無顯著差異 ($p=0.418$)，查核主管與會計果則指出，兩者平均 P 分數之差異達邊際性之顯著水準 ($p=0.052$)。

除上述假說之檢定外，為探討性別因素對會計系大四學生與事務所從業人員道德判斷水準之影響，另針對相關樣本之 P 分數進行假說 5 之檢定。以 t 檢定分析男性與女性平均 P 分數之差異該結果指出女性(37.35)之平均 P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33.71) ($t=2.180, p=0.031$)。由於表十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份與性別無交互作用，且性別因子亦具顯著之主要效果($p=0.043$)，故推翻假說 5，亦即會計系大四學生與事務所從業人員之 P 分數因性別不同而會有顯著差異，而女性之平均 P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

三、我國會計人員道德發展變化整理

根據前述對會計大一新生、大四學生、事務所基層查核人員、事務所主管之 P 分數的發現，本研究整理如圖三來捕捉我國會計人員道德發展之變化情況。因為本研究也發現性別具顯著差異，所以圖三也將男性與女性會計人員之道德發展變化加以區分。由圖三明顯看出，相對於此四組 P 分數之比較，學生在大一剛進入會計系就讀時，其道德發展分數是不低的，但 4 年大學會計教育之求學過程反而使得其道德分數顯著降低，於畢業後進入事務所初期，工作經驗與環境又讓其道德分數逐漸提昇，而且隨著職階之提昇而上升至略高於原大一之狀況。值得一提的是各階段都是女性道德分數顯著高於男性，前述變化趨勢並不因性別而有所不同，亦即如果單獨以男性（或女性）作為比較基礎，圖三顯示由大一至大四之下降趨勢，至事務所工作時 P 分數又開始回升，且隨著工作經驗之累積，P 分數由基層查核人員持續上升至查核主管之變動趨勢，於控制男女性別後，仍然成立¹¹。

為比較會計系大一、大四學生與事務所查核人員道德判斷發展階段之分佈情形，另將受試者各階段原始分數轉換成標準分數¹²後進行主型階段之判別

¹¹ 本研究發現事務所高職等之主管其 P 分數高於基層查核員，也發現女性之 P 分數高於男性，因此高職等主管具較高 P 分數之發現，是否係肇因於本研究樣本中高職等主管有較多之女性所致，而非事務所工作經驗之影響（尤其是表五顯示，本研究樣本中查核人員之比例不論是基層人員或高階主管之女性均高於男性）？但根據圖三分別列示男性與女性道德發展變化趨勢得知，在單獨考慮男性或女性之樣本後，二者之 P 分數變化趨勢相當一致，都是高階主管高於基層查核人員，而且男性高階主管之平均 P 分數（37.30）的確也高於女性之基層查核人員（35.12）。故前述懷疑成立之可能性應該不大。且本研究進一步對身分別（基層查核員與高職等主管）與性別（男與女）此二變數進行獨立性之卡方檢定，發現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p=0.156$ ）。所以不論根據卡方檢定與圖三之結果，均支持本研究高職等主管道德推理能力較高之發現，應該並非是由樣本包括之性別差異所引起。但實務上會計師事務所之高職等主管似乎以男性均多，個中原因值得探討。或許這與本研究樣本結構無關，而是會計師事務所的現象，亦即 survival bias。作者十分感謝審查教授此意見之提供。

¹² 某階段之標準分數 = (該階段原始分數 - M) / SD，M 係指常模 (norm) 受試者之階段原始分數平均值，SD 則為標準差。本實驗所用之 M 與 SD 係參照「大專道德判斷測驗使用手冊」（林邦傑等，1986）中以 3,870 位我國大專學生的 DIT 各階段原始分數所建立之常模平均值與標準差。

¹³, 再統計各階段的人數佔比, 其結果列示如表十二及圖四¹⁴。本研究在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道德發展階段主型之發現上, 與林松宏等(2002)之結果相同, 均以發展階段四所佔之比例為最高。

表十二 會計人員道德判斷發展主型階段之分佈情形

階段或項目	會一 (n=51)		會四 (n=46)		基層查核人員 (n=67)		查核主管 (n=65)		合計 (n=229)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階段 2	9	17.6	9	19.6	13	19.4	3	4.6	34	14.8
階段 3	8	15.7	4	8.7	9	13.4	9	13.8	30	13.1
階段 4	4	7.8	11	23.9	14	20.9	18	27.8	47	20.5
階段 5	7	13.7	5	10.8	6	9.0	11	16.9	29	12.7
階段 6	0	0.0	0	0.0	5	7.5	3	4.6	8	3.5
階段 A	9	17.6	9	19.6	8	11.9	9	13.8	35	15.3
M	6	11.8	3	6.5	3	4.5	7	10.8	19	8.3
Non-type	8	15.7	5	10.9	9	13.4	5	7.7	27	11.8
小計	51	100	46	100	67	100	65	100	229	100

^a 階段 A 為反建制導向, 反對現存社會體制, 嚮往烏托邦式社會的心理導向所致, 其道德發展階段應介於 4~5 之過渡期間, 亦可稱為 4.5 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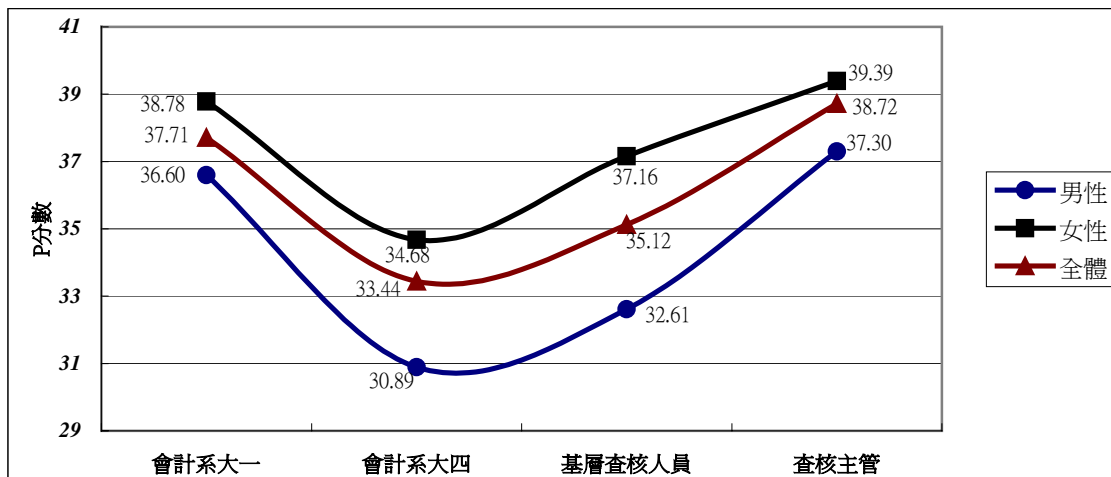
^b M 並不代表某一階段, 受試者若僅有 M 項目的標準分數大於或等於「+1」, 則將其主型歸類為「M」, 但此類受試者的 M 分數仍低於 DIT 手冊(Rest 1986a)的廢卷剔除標準。

^c Non-type 指受試者無任何階段標準分數大或等於「+1」, 即受試者的道德發展不屬於任何一個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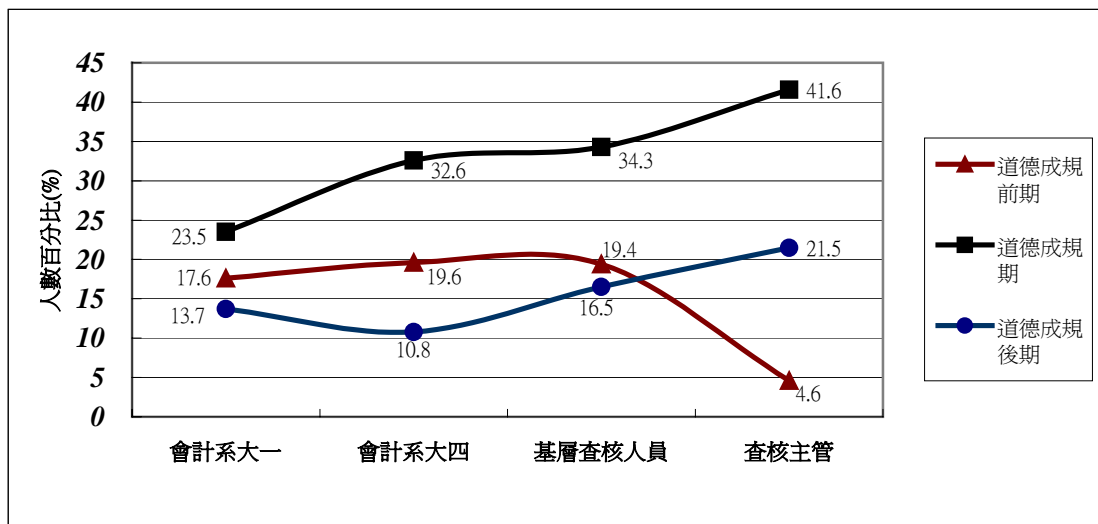
根據表十二及圖四之分佈情形得知, 道德成規前期之人數比重在學生受教育期間無明顯變化(大一: 17.6%; 大四: 19.6%), 但進入事務所工作並擔任主管後出現驟降情形(基層: 19.4%; 主管: 4.6%), 顯示學校教育對學生的道德推理成熟度並沒有正面的作用, 但事務所工作經驗則明顯有助會計人員道德之發展; 由道德成規後期之比重變化也得到相同之印證: 會計人員之事務所工作經驗對其道德判斷成熟度有提升的效果(基層之 16.5% 上升至主管之 21.5%), 但學校教育則較無助(大一之 13.7% 反而下降至 10.8%)。此外, 道德成規期之人數比重則從學生至查核主管呈穩定上升之趨勢, 且此層次在會計系一年級、四年級、基層查核人員、與查核主管皆有最高的佔比(分別為 23.5%、32.6%、34.3%、41.6%), 由於道德成規期乃是強調法律與規則之遵守, 此一現象可能隱含著受試者隨著會計專業教育或工作經驗之累積, 其準則遵循之道德判斷取向有加強的趨勢。

¹³ 凡標準分數在「+1」以上者, 表示其道德判斷之發展屬於該階段; 如有二個階段的標準分數均在「+1」以上, 則有二個類型, 最高者為主型(major type), 次高者為副型(submajor type); 如無任何階段之標準分數大於或等於「+1」, 則表示該受試者不屬於任何一個類型(non-type)(林邦傑等, 1986)。

¹⁴ 圖二所彙示的是 Kohlberg 三個道德發展層次(如表 1)之受試者人數分佈情形, 而 DIT 之階段 A、M 項目與 non-type 則不包含於該圖之數值, 故每組受試者之人數分佈百分比合計數未達 100%。



圖三 會計人員之 DIT P 分數變化圖示



圖四 會計人員道德判斷層次分佈圖

四、啟示

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啟示：

- 由於新生之平均 P 分數(38.47)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生之平均 P 分數(32.90)，此現象可能指出大學會計或企管教育對學生之道德判斷成熟度並無重大助益，其潛在原因可能係如 Schwartz et al. (1991)所指稱，學生在商業教育之薰陶下，僅注重如何成功牟利以致在正確行為與謀取作為之間未能區辨其差異。此外，亦有可能係學生在受教期間缺乏積極且有效之道德教育啟發，以致其原則性道德思考之發展受到阻礙，或是與學校環境縱容其不當之學習行為有關。當然，此現象也可能如 Ho (1997)所指，係肇因於國內教師於

講授時，對道德相關議題之不重視。不論原因為何，此現象值得教育界所重視。

2. 就科系別差異而言，雖然會計專業被期待對公眾利益負有責任，且會計教育對職業道德亦有所強調，但會計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成熟度並未因其專業教育之影響而高於企管系學生。持道德認知發展觀點之學者認為，較成熟的道德批判思考有助於個人的正直或道德價值觀之培養。如果社會大眾對會計專業寄予較高的道德期待，則會計學子可能更有必要貯備較成熟的道德思辨能力，以審慎應對就業時可能面臨之利益衝突困境。由於商業型態與活動日趨複雜，而職業道德規範又未必能提供完備的行為指引，故會計教育或許應考慮如何在職能訓練以外，對學生的道德認知給予更多的啟發與薰陶。
3. 就性別而言，女性學生之平均 P 分數(37.88)顯著高於男性學生(33.22)，女性會計人員之平均 P 分數(37.35)亦顯著高於男性(33.71)。此一結果可以提供予施教者作為道德教育方法之參考，除了課堂講授方式外，若可利用性別差異之不同觀點激發學生作較深入的道德思辨與意見交流，也許能有助於提高學生對道德教育的參與熱誠。此外，就事務所的在職教育與任務指派而言，由於女性具較高的道德判斷成熟度，其對道德困境之決策取向應有值得重視之處。
4. 本研究發現大學會計專業教育對道德判斷水準並無正面之助益，但事務所之工作過程對查核人員之道德判斷水準則有提升效果，使得主管人員之 P 分數高於基層人員與會計系大四學生，可能是事務所的實務經驗與專業訓練使主管人員較重視道德判斷能力之養成。由於大學會計系為國內事務所之重要人才庫，為能配合事務所主管人才之需求並加強學生之競爭優勢，其專業教育應對道德議題之探討予以更多的重視，若得以事務所實際道德困境案例做為參考教材，對於學生道德判斷能力之培養，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伍、結論、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以 203 位會計系與企管系學生為 DIT 受試者，以探討年級、科系、性別對其道德判斷水準之影響，其結果顯示大一新生之 P 分數顯著高於大四學生，女性學生之 P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學生，會計系學生與企管系學生之 P 分數則無顯著差異。針對 178 位會計系大四學生與事務所查核人員所進行的 DIT 研究發現，事務所查核主管之 P 分數高於基層查核人員且顯著高於會計系大四學生，後兩者之 P 分數則無顯著差異。此外，本研究為國內第一篇捕捉我國會計學生由大一至大四、畢業後至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基層查核工作至擢升查核主管

之道德發展變化過程之研究。根據會計人員 P 分數之變化與道德發展主型階段分佈情形亦再度指出，會計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成熟度並未因接受大學四年之會計專業教育而有所提升，但事務所之工作過程對查核人員之道德判斷水準則有提升效果。此現象可能透露出國內大學會計教育體系中道德教育之缺乏或其成效之不彰，而事務所人才擢升政策對查核人員道德判斷能力之培養可以發揮正面之助益。在性別效果方面，本研究也發現女性會計學生與查核人員之 P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本研究之限制與後續建議說明如下：

1. 就學生樣本而言，本研究僅以一所大學為學生受試者之來源，故研究發現可能係該校教學環境之特性所造成，無法類推至整體教育現象。後續研究可以納入較多元與地域較廣泛之教育體系為受試者來源，如兼以公立大學、私立大學、技職院校等學生為施測對象，以驗證本研究之發現。就查核人員樣本而言，本研究之受試者來源並未均勻遍及大、中、小型事務所，故對其規模、歷史、服務品質等因素對從業者道德判斷之影響未加以考量，後續研究可以擴大取樣範圍而針對此類變數進行深入之探討。
2. 針對道德發展之影響變數而言，本研究係採橫斷面(cross sectional)之比較作分析，而非針對同一群受試者作長期性(longitudinal)之追蹤檢測，故對受試者道德發展歷程未能完整捕捉，後續研究亦可採用長期性之方式，以期對教育與工作環境之影響道德發展程度有更深入之探討。
3. 道德研究可能會出現「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現象 (Cruz, Shafer and Strawser 2000)。本研究雖發現大四學生之道德發展成熟度低於會計師事務所之從業人員，但此是否於肇因於填寫道德問卷時，學生較直率、單純或無利害關係，而事務所查核人員較會為了個人或組織顏面，迎合更好的答案，而產生社會期望偏誤所致¹⁵？後續研究可探討此可能性並控制社會期望偏誤對研究之可能影響。
4. 本研究所採用之 DIT 個案為一般性(generic)之道德困境，但有學者（例如 Arnold 1997；Thorne 2001）主張，特定情境(context-specific)之屬性可能影響個人之道德判斷，故有必要採用與受試者較切身相關之道德困境情節進行道德判斷之檢測，因此後續研究亦可兼用企管或會計工作之相關之專業道德個案進行分析，以探討情境差異對道德判斷之可能影響。
5. 本研究以 DIT 來作為衡量受試者道德發展之工具，故研究發現之有效性與 DIT 之效度息息相關。後續研究可考慮用不同之道德衡量工具（如 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MES；或是 sociomoral reflection objective measure, SROM），以測試研究發現之堅韌性。

¹⁵ 作者感謝審查教授題提出此點意見，惟本研究發現大一學生之平均 P 分數高於事務所基層查核人員，所以研究結果受到社會期望偏誤影響之可能性應該不大。

參考文獻

- 朱寶珠，1994，我國大學會計教育現況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明隆，2001，SPSS 統計應用實務，松崗電腦。
- 林文堯，1994，社會道德沉思法精簡版之信效度分析研究：以台北市大學生與中小學生為樣本，私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邦傑、胡秉正與翁淑緣，1986，大專道德判斷測驗使用手冊，教育部委託研究計劃。
- 林宜滢，2003，國中道德氣氛與學生道德發展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松宏、葉誌崇與吳祥發，2002，中美會計專業人員之價值觀、社會心理態度、宗教觀與道德判斷之跨文化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學報，37：137-167。
- 林煌，1990，道德判斷與道德價值取向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鳳麗，2002，商學學生道德認知之實證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第 15 期：163-188。
- 梁薰方，1994，時間預算壓力下，解釋責任、道德判斷與審計人員反功能行為關係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依蘋，2002，EQ 與道德—安隆案之省思，會計研究月刊，第 196 期：12。
- 黃光明，1999，聽覺障礙學生道德判斷及其家庭影響因素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慈娟，2001，會計教育對會計系在校生職業道德認知影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傅若昀，1996，經驗、效率與審計判斷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淑玲，2003，會計實務與學習行為道德態度之探討，私立淡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金花，1990，道德兩難情境討論團體對處儘國小六年級學生道德判斷發展效果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益榮，2000，商學學生個人價值觀與道德判斷及其關聯性之探討，私立逢甲大學會計與財稅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靖國，2002，國民教育階段學童之儒家道德判斷與現代道德判斷之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慧慧，2002，國中資優生情緒智力與道德判斷關係之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顏信輝與楊淑玲，2003，我國會計系實施道德倫理教育現況及教師態度之探索性研究，會計研究月刊，第 214 期：121-131。
- Abdolmohammadi, M, J., W. J. Read, and D. P. Scarbrough. 2003. Does selection-socialization help to explain accountants' weak ethical reason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 42: 71-81.
- Abdolmohammadi, M, J., and M. F. Reeves. 2000.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on business students' ethical cognition: A cross 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y. *Teaching Business Ethic* 4: 269-284.
- Ahadiat, N., and K. J. Smith. 1994. A factor-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employee selection factors of significance to recruiters of entry-level accountants. *Issue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9: 59-67.
- Armstrong, M. B. 1993. 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A sample course.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1: 77-92.
- Armstrong, M. B., and S. Mintz. 1989. Ethics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Present statu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Accountants Journal* 1: 70-96.
- Arnold, V. 1997.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part I: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V. Arnold and S. G. Sutton eds.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49-89. Sarasota, FL.
- Arnold, D., and L. Ponemon. 1987. Moral judgment perspective for the various auditing judgment issu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counting Association* 2: 47-57.
- Arnold, D., and L. Ponemon. 1991. Internal auditors' perceptions of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moral reasoning: An experiment. *Auditing: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 1-15.
- Arnold, V., and S, G. Sutton. 1997.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Sarasota, FL.
- Beltramini, R., R. Peterson, and G. Kozmetsky. 1984. Concerns of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 195-200.
- Bernardi, R. 1994. Fraud detection: The effect of client integrity and competence

- and auditor cognitive style. *Auditing: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3 (Supplement): 68-84.
- Bernardi, R., and D. Arnold. 1997. An examination of moral development within public accounting by gender, staff level and fir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4 (Winter): 653-668.
- Borkowski, S. C., and Y. J. Ugras. 1992. The ethical attitudes of students as a function of age, sex and experi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961-979.
- Borkowski, S. C., and Y. J. Ugras. 1998. Business students and ethic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7: 1117-1127.
- Brabeck, M. 1984.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histle-blow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8: 41-53.
- Clikeman, P. M., and S. L. Henning. 2000. The socialization of undergraduate accounting students.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15 (February): 1-17.
- Cohen, R., and L. W. Pant. 1989. Accounting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ethics in the curriculum.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4: 70-81.
- Cohen, R., L. W. Pant, and D. Sharp. 2001. An exami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between Canadian business students and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0: 319-336.
- Cruz, A. C., W. E. Shafer, and J. R. Strawser. 2000.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ax practitioners' ethical judg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4 (3): 223-244.
- Davis, J. R., and E. R. Welton. 1991. Professional ethics: Business students' percep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 451-463.
- Etherington, L., and L. Schulting. 1995. Ethical development of accountants: The case of Canadian CMAs'. *Research on Accounting Ethics* 1: 235-251.
- Eynon, G., N., T. Hill, and P. Clarke. 1996.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thical reasoning abilities: accounting students from Ire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4 (4): 477-492.
- Ford, R. C., and W. D. Richardson. 1994.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 206-221.
- Gautschi, F. H., and T. Jones. 1998.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business students to recognize ethical issu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urse in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7: 433-443.
- Giacomino, D. E. 1992. Ethical perceptions of accounting majors and other

- business majors: An empirical study *Accounting Educators' Journal* 4: 1-26.
- Giacomino, D. E., and M. D. Akers. 1998.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rsonal value and value types of female and male accounting and nonaccounting majors.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August): 565-584.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n, S., and J. Weber. 1997. Influencing ethical development: Exposing students to the AICPA code of conduc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6: 777-790.
- Henderson, V. E. 1988. Can Business Ethics be Taught? *Management Review* 77: 52-54.
- Hiltebeitel, K., and S. Jones. 1991. Initi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integrating ethics into accounting education.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6: 262-275.
- Ho, Shih-Jen. 1997. Ethical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tudents and public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Research on Accounting Ethics* 3: 293-303.
- Jeffrey, C. 1993. Ethical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tudents, nonaccounting business students, and liberal arts students.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8 (Spring): 86-96.
- Kohlberg, L. 1969. 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347-480. Rand McNally, Chicago, IL.
- LaGrone, M., E. Welton, and R. Davis. 1996. Are the effects of accounting ethics interventions transitory or persist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4 (3): 259-276.
- Lampe, J. 1994. The impact of ethics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curricula. *Proceedings of the Ernst & Young Research on Accounting Ethics Symposium*: 220-236.
- Lord, A. T., and F. T. DeZoort. 2001. The impact of commitment and moral reasoning on auditors responses to social influence pressur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6: 215-235.
- Louwers, T., L. Ponemon, , and R. Radtke. 1997. Examining accountants' ethical behavior: A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Arnold, V. and S. Sutton(eds.).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 188-221. Sarasota, FL.
- McNeel, P. 1994. College teaching and student moral development. In Rest, J. and D. Narvaez (eds.).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fessions: 27-50*. Hillsdale, NJ.
- Pierre, S. T., K., E. Nelson, and A. Gabbin. 1990. A study of the ethical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majors in relation to other business and nonbusiness disciplines. *The Accounting Educators' Journal* 1 (Summer): 23-35.
- Ponemon, L. 1992. Ethical reasoning and selection socialization in accounting.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 (April/May): 239-258.
- Ponemon, L. 1995. The objectivity of accountants' litigation support judgmen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70: 467-488.
- Ponemon, L., and A. Glazer. 1990. Accounting education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learning on students and alumni in accounting practice.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21: 21-34.
- Ponemon, L., and D. Gabhart .1993. Ethical reasoning in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Research Monograph* 21. Vancouver, BC: CGA-Canada Research Foundation.
- Rampersad, H. K. 2003. The links between individual learning,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ethics.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Methods* 17: 201-400.
- Rest, J. 1986a. *DIT Manual*, 3rd e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 Rest, J. 1986b.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50-78.
- Ruegger, D., and E. W. King. 1992.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upon student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179-186.
- Schwartz, R. H., S. Kassem, and D. Ludwig. 1991. The role of business schools in managing the incongruence between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doing what it takes to get ahead.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 465-469.
- Shaub, M. 1994. An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with the moral reasoning of auditing students and audito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2 (1): 1-26.
- Thorne, L. 2001. Refocusing ethics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An exa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udents' tendency to use their cognitive moral capabi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9 (March): 103-117.

附錄：DIT 道德故事範例

某地有個婦人，罹患了一種特殊的癌症，性命很危險。醫生們認為有一種藥劑或許可以救她，恰巧有個藥劑師最近已調製出此種藥品。這種藥劑的成本很高，每一劑量花了藥劑師二萬元本錢，他卻開價二十萬元才肯賣。

這個婦人的丈夫 A 君到處借錢，還籌不到十萬元。A 君只好懇求藥劑師算便宜點或允許他以後再付款，因為妻子快要病死了。但是藥劑師卻說：「不行，這種藥劑是我發明的，而且我要用它來賺錢。」

A 君又著急又絕望，因此，他開始有了闖入藥劑師家去偷藥的想法。

- 請問您認為 A 君應不應該去偷藥以拯救其太太之性命？（請就下列三者選擇一項，並於該項之方格內打“√”）

1. 應該去偷

2. 無法作決定

3. 不應該去偷

【A 部份】

當您在作前述之判斷時，下列每一個陳述，對您決策之制定分別具有何種重要性程度？（請就五種重要性程度擇一適當之方格打“√”）

最 重 還 不 毫

重 要 算 重 不

要 重 要 重

要 要

1. 法律的威信如果因為破例而受到影響，怎麼辦？
2. 一位愛太太的丈夫，基於夫妻之情而去偷藥，不也是很自然的嗎？
3. A 君萬一被人發現，送進監牢，怎麼辦？
4. A 君是不是個職業摔角選手？或者他對職業摔角選手們有相當的影響力？
5. A 君偷藥是為了自己還是純粹為了幫助別人？
6. 藥劑師對其藥方所擁有的權利，是否應該受到尊重？
7. 無論從社會或個人的角度來看，生命的存在是否比死亡的終止更具有意義？
8. 是否應考慮到社會上的某些價值，而這些價值是作為規範人們應如何彼此對待的基礎？
9. 藥劑師這樣的作法，該不該受到這種只用來保護有錢人的法律所庇護？
10. 在這個故事中，所涉及的法律條文，是否考慮到社會上每一成員的基本權益？
11. 藥劑師如此地貪心與無情，他是否活該被偷？
12. 在這個情形下，偷竊行為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否利多於弊？

【B 部份】

請將您 A 部份的回答，分別依重要性程度排序，再選出前四個最重要的陳述，並將其題號填入下列空格中：

第一重要者：_____ 第二重要者：_____ 第三重要者：_____ 第四重要者：_____